5 a

1 . . . .quwraoqnïng ɵngrəsin kidin(in)　　不知队伍的

2 . bilgəli bolmadï . .　　前后。

注　释

① A. von Gabain: Die Uigurische U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üen-Tsangs, SPAW, 1935, Berlin, s. 4.

② Yu. Tugusheva: Uigurskaya versiya biografii Syuan'-tszana, Pismenniye pamyatniki vostoka, 1971, Moskva, str. 256.

③ W. Radloff, S. E Malov: Suvarnaprabhasa (Uig. Redaktion). Petersburg, 1913, s, 343-344; F. W. K. Müller: Uigurica, Berlin, 1908, s. 13-14.

④ Türk Dili Arastarmalari yilligi, Ankara, 1965, p. 31. 该书回鹘文译本的其它残叶1976年由德国 K. Röhborn 刊布在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Band 127, Heft 1, s. 87-100.

⑤ 参见《羽田亨博士史学论文集》下篇，东京，1958，339页。

⑥ 参见拉德洛夫前引书，14页。

⑦ 由于这个问题（即 x，s 的区分问题）牵涉到古代回鹘语属于 x 方言抑或 s方言这一重要问题，因此在下面文献的拉丁字母转写部分中未按通常惯例参酌现代语言加以区分，而是一律转写为 s，以示存真。

⑧ 郭沫若：《〈坎曼尔诗签〉试探》，载《出土文物二三事》，北京，1972，9页。

⑨ 《元史》卷130，202，134。近年来在我国和柏林的吐鲁番搜集品中发现了后三人的回鹘文作品。

⑩ 最近翻阅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AOH，t. XXX，1976，p. 257），得知美国学者阿尔洛托（A. T. Arlotto）和土耳其学者特兹江（S. Tezcan）于1966年、1975 年曾对我国影印出版的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第十卷中若干叶作过研究，因都是打字本，尚未得见。

⑪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暂发表原文四叶（八面）的拉丁字母转写、汉译文和附注。词汇和语法成分表一并从略。

《民族研究》简介

《民族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是从事民族研究、民族教学和民族工作的同志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的园地。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理论联系实际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学术上自由讨论、相互争鸣，为繁荣我国各民族科学文化、加强民族之间团结、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民族研究》既刊登有关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各民族（包括历史上的民族）历史、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民族语言文字（包括古文字）、各民族的现状和社会形态以及有关世界民族的研究（包括历史和现状的研究）论文，也发表有关民族方面的调查报告、学术资料、史料考证、书刊评介及民族学术动态的报导等等。

《民族研究》为双月刊，逢单月出版，每期八十面、约十二万字，售价三角五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民族印刷厂印刷，国内由全国各地邮局发行，国外由中国国际书店总发行处发行。该刊第一期已于九月二十日出版。

关于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大字“纥”的读音

刘凤翥

辽、金、元三史中有关“纥（紇）”字的军制、官制和户制等北方游牧民族所特有的制度是中外史学家长期争论而莫衷一是的重要课题之一。如果能把“纥”字的读音正确释出，或许会有助于进一步的研究。本文试图考释一下“纥”字的读音。为了印刷方便，我们把一些例字集中编号制版，附于文末，在行文中采用代号来代替例字。

“纥”字始见于辽代，往往与“紇”字相混使用。为了正确释读，首先应当弄清辽金史中的这两个字哪一个是正字，哪一个是别字。其次要弄清正字是汉字还是契丹字。如果是契丹字，又须弄清是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只有弄清这些问题之后才能对它进行正确解读。

日本的箭内亘曾反复论证“纥”为正字，“紇”为错字的理由①。后来王国维提出相反的意见，谓“辽金元三史中的紇字，绝非误字，其或作纥者，乃紇字之省②。”与箭内亘意见相同的有陈述先生③；与王国维意见相同的有朱子方同志④和谷霁光同志⑤。两种不同的意见长期并立。

日本的羽田亨首倡“纥”字为契丹字之说以质箭内亘⑥。当时由于证据不足，未能使箭内亘信服⑦。王国维也声言“国维宁信昔人取契丹或女真此字以入汉籍者⑧。”后来陈述先生采取羽田亨的意见，主张“纥”字为契丹字，并提出此字来源于本文例字表（下同）中1号契丹小字的主张⑨。谔士一方面断言此字“不是汉字而是契丹字⑩”，另一方面又把此字与2号契丹小字和3号契丹小字的草体以及7号女真字相比附，认为“有理由说‘纥’是一种契丹字和女真字的混合体⑪”，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我认为，是契丹字和脱胎于契丹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是契丹字，是说它原原本本地是一个契丹字。脱胎于契丹字，是说它是一个汉字，这个汉字由某一个契丹字脱胎而来。“纥”字不可能是由1号契丹小字脱胎而来，因为在汉字中就有与1号契丹小字字形完全相同的字，例如《康熙字典》丑集中土部就有“圪”字，注音“乌黠切”和“乙黠切，音轧”，《龙龛手鉴》卷二土部也两处收录此字，一音“于罰反”，一音“乌点切”。如果说“纥”是由1号契丹小字脱胎而来，那么《康熙字典》和《龙龛手鉴》中与1号契丹小字字形完全相同的字又是怎么来的呢？所以脱胎1号契丹小字之说不能令人信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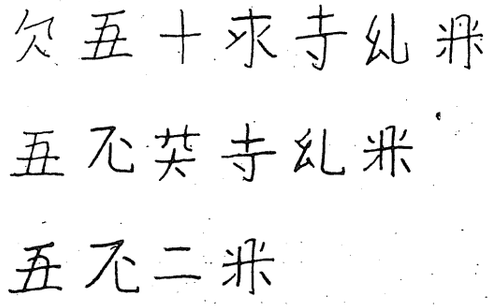
“是契丹字”和“是一种契丹字和女真字的混合体”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契丹字，是说它原本是一个契丹字；混合体是由两种文字混合而成的新字。若由女真文字混合而成，不言而喻，必须在女真文字造出之后才能进行。众所周知，女真大字是在金代天辅三年（公元一一一九年）创制的，此年上距契丹大字的创制已近二百年，下距辽亡国仅有六年，契丹文字的造字过程早已结束，契丹文字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况下，混合契丹字和女真字而成的字，只能是汉字而不能是契丹字。所以“是契丹字”和“混合体”两者互相矛盾。

随着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的出土，给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线曙光。

北大王为耶律万辛，其墓在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昆都公社乌苏伊合生产队

的沙日温都地方。该墓在解放前即被盗，只剩墓志一合。1976年春，阿旗文化馆的马俊山同志将墓志从生产队运至旗文化馆收藏。同年五月，马俊山同志寄给我一份墓志拓片，可惜拓本因用墨不善不太清楚。1978年9月初，我赴阿旗，在文化馆的马荣、希恩尼根和达固拉等同志的协助下，又拓了几份拓片并拍了照片。对该墓志的详细研究虽然还有待于今后，然而关于“纵”字却有一点体会，把它写在下面供有关同志参考。

《北大王墓志》共有汉字志盖和契丹大字志文两石。汉字部分第九行有“大王入仕年月，历宦官姿，并次于契丹字内”一句话。说明汉字和契丹字各有侧重，不是互相对译的。汉字部分着重说明地灵人杰和大王的亲属；契丹字部分是履历表。契丹字部分第四、第五和第六行各有一个纪年，它们是：



其中两次出现了“纵”字。《北大王墓志》契丹字部分第二十二行也出现这个字。这就准确无误地表明，混入汉字中的“纵”原来是一个契丹大字，其字形本不作“纵”，也不作1号契丹小字和2号契丹小字，更不作3号契丹小字。至于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城子出土的辽代大安七年的汉文题名残刻上有“纵首西头供奉官”⑫字样，说明早在辽代，契丹大字“纵”就已混入了汉字。由于汉字中原无此字，往往把此字与汉字“纵”相混淆，于是“纵”就成了“纵”的别字。这说明两者相混的情况早在辽代就有，不是南宋人的傅会之误。

弄清“纵”字的正确字形和它是契丹大字之后，再来考释它的读音就方便了。我们先看看学者们以前关于此字读音的种种说法。

明代四夷馆编的《女真译语》来文中用7号女真字来音译“纵”，而7号女真字音“又”，说明在《女真译语》中此字音“又”。明末清初的邵远平认为此字“音查⑬”。箭内亘认为此字“之读音或与迪字相同⑭。”王国维认为此字“之音读如主，亦读如欧⑮。”李逸友同志也主张“纵”与“主”通用⑯。松井等认为“纵近于札，故纵音札、查⑰。”朱子方同志和谷霁光同志都认为“纵”字读音与汉字“纠”相同⑱。陈述先生则认为“纵”字“之音为khara、čara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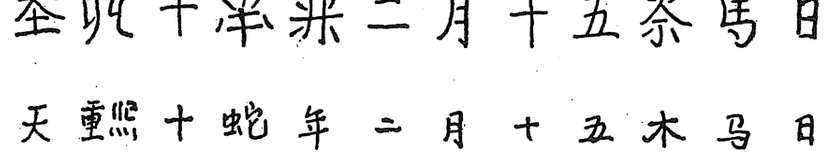
“纵”字既然是一个契丹大字，要想根本解决问题，非从契丹大字的解读入手不可。

契丹文字有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字形虽然都近似于汉字，然而前者是表意文字，后者是拼音文字。《北大王墓志》属契丹大字。契丹大字是参照汉字制成的；传世的女真文字则是参照契丹大字制成的。我们就是从这样两个方面并参照契丹小字来进行探索的。

现在用上述方法先来解读《北大王墓志》中的三个纪年。根据阎万章同志的研究成果，上面三个纪年中的每行最后一字为“年”字之意⑳。第二个纪年和第三个纪年开头的两个字相同，相当于年号。第三个纪年既为“某某二年”，则第二个纪年必为某某元年。第一个纪年开头的两个字是年号，其中第二字与第二个纪年和第三个纪年中年号部分的第一个字相同。

第一个纪年的年号后的“十”字和第三个纪年的年号后的“二”字都是直接借用的汉字。

根据墓志盖汉文部分，墓主人死于重熙十年二月十五日，翻译该纪年部分的契丹大字在第十九行，作：



天 重熙 十 蛇 年 二 月 十 五 木 马 日

契丹大字是神册五年(公元九二〇年)创制并颁行的，神册总共只有六年，神册之后的天赞只有五年，而上述第一个纪年不少于十年，所以上述三个纪年应到天赞之后和重熙之前去找。在这之间共有天显、会同、大同、天禄、应历、保宁、乾亨、统和、开泰、太平和景福十一个年号。我们必须在这十一个年号中进行筛选。附加条件有三：一是第一个纪年的年号不少于十年；二是第一个纪年的年号中的第二字和第二及第三个纪年中年号的第一字相同；三是第一个纪年的干支部分与第二个纪年的干支部分有两个字相同。也就是说，第一个纪年是在十年或十几年改的元，改元的当年应为第二个纪年的元年。

根据上述条件，我们对天赞以后和重熙以前的年号逐个进行了筛选。结果是：第一个纪年的年号只能是“开泰”；第二个和第三个纪年的年号只能是“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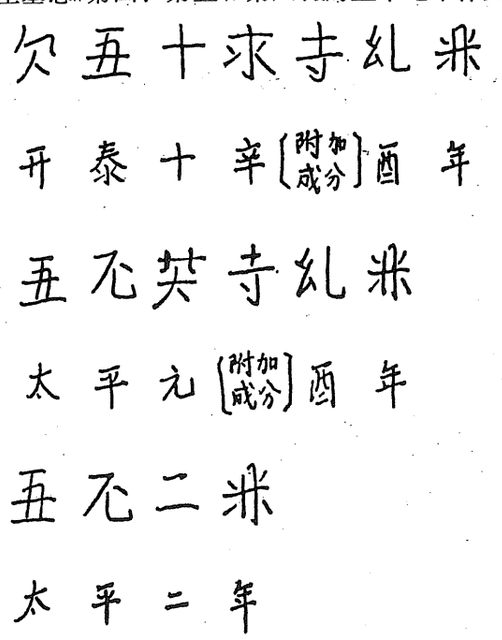
“泰”与“太”无论是在音的方面还是在义的方面都是相通的。开泰十年改元太平，因而第一个纪年的第四个字不是数目字，而是干支部分。开泰十年和太平元年都是辛酉年。在契丹小字中，“庚”和“辛”均作4号契丹小字。第一个纪年的第四字和4号契丹小字的区别仅仅在于中间的一竖是向上出头或不出头，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一个纪年的第四字释为“庚”和“辛”。第一个纪年中的第五个字是契丹大字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字，我推测它是表示语法关系的附加成份，而不是一个实词。只有“纵”才是相当于“酉”的实词。

契丹大字较契丹小字与汉字的关系更为密切，汉语借词也更多。在契丹小字中，年号和干支是用契丹语说的；而在契丹大字中，年号和干支多半可能是汉语借词。我们设想：契丹人原无干支这套概念，是在长期与汉人接触中学来的。一开始是把汉人的干支硬借过来，后来由于太抽象，不易理解，于是又用五行代十干，用十二兽代十二支。此时的十二兽也有用汉语借词的，例如表示“午”的契丹大字很可能是汉语借词“马”。到了契丹小字阶段，十二兽中的汉语借词减少，例如“午”或“马”作5号契丹小字，音 muri， 用本民族语言来称说。但在契丹小字中，“辰”或“龙”仍保留汉语借词的痕迹，音“禄”。因此，表示“酉”的契丹大字“纵”或者是汉语借词“酉”的音译，或者是汉语“鸡”的音译，不像是用的本民族语言。因为“酉”在契丹小字中作6号契丹小字，音 deha，是多音节，而“纵”字不像是一个多音节的字。倘若“纵”字是汉语“酉”的音译，那么该字当来源于汉字“幼”或“幺”，并由该契丹大字派生出7号女真字（音“又”）。如果该契丹大字是音译的汉字“鸡”，那么该字当来源于汉字“纪”。不过从“酉”字太抽象，不便译为契丹语，而“鸡”字则较易于译为契丹语的情况看，“纵”为“酉”的音译的可能性更大。

与“纵”相近的汉字是“幼”和“幺”，相近的女真字是7号女真字。各种版本的《女真译语》都标明7号女真字音“又”。在罗福成类次的《女真译语》第二册《海西建州纵卫都指挥使哈出哈的来文》中，一开头的六个女真字是音译的“海西建州纵卫”六字。其中与“纵”

对译的是7号女真字。7号女真字既然音“又”，与它对应音译的字当然也应音“又”。“又”与“右”同音。“建州纠卫”即“建州右卫”。因此可以推知，在修《女真译语》的明代，译语作者还认识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大字“纠”，而且还知道该字与“右”有同音互借的用法。

“纠”和“右”可以同音互借，“右”又与“酉”同音，当然可以用“纠”来音译“酉”。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北大王墓志》第四、第五和第六行的三个纪年释义如下：



其中的“开泰”和“太平”可能都是汉语借词。“酉”也是汉语借词。

由汉字“幼”到契丹大字“纠”，再由该契丹大字到7号女真字，字形仅仅变化了右边的偏旁，决定其读音的左边的“幺”一直没变。这都说明《女真译语》和《续宏简录元史类编》的注音都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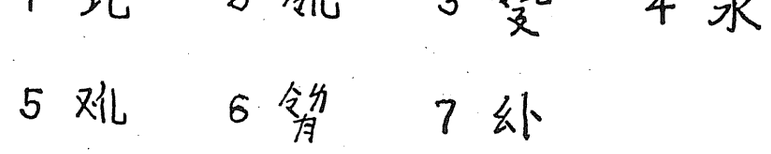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大字“纠”的读音，再来探索辽、金、元三史中有关此字的各项制度就方便多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都有用一个契丹字来音译几个发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的现象。此字既然可以音译“酉”、“右”，当然也可以音译汉字“游”、“幼”、“优”等字。当它混入汉字之后，就和这些汉字同音互借。它的别字“糾”也与它的作用相同。辽、金、元三朝都是祖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政治、经济、军事无不与游牧有关。所以带“纠(糾)”字的各项制度，或许可以从同音互借的“遊”、“游”、“右”、“优”等字得到解释。《辽史》中的“边防糾户[21]”即“边防游户”，也就是边远游牧民之意，“糾详稳”、“糾都监”、“糾将军”、“糾小将军[22]”中的“糾”可训为“右”，“糾军[23]”即“游军”，也即骑兵之意。元代有“游兵”，例如《金史》中就有“大元游兵入居庸关[24]”的记载。这些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证的范畴，容另找机会再述拙见。

总之，“纠”字始见于辽代。它是参照汉字“幼”或“幺”而创制的一个读音为“幼”的契丹大字。就在辽代，这个契丹大字被混入汉字。由于汉字中原没有这个字，在使用时往往与字形相近的汉字“糾”字相混淆，于是还在辽代“糾”字就成了“纠”字的异体字。

“糾”字是固有的汉字。《广韵》、《集韵》和《康熙字典》均有著录。《后汉书》隗嚣传有

“援旗糾族[25]”之句。在“纠”字混入汉字之前，“糾”字往往和“纠”通用；在“纠”字混入汉字之后，“糾”字又与“纠”字混用。“糾”字始终是一个汉字。在契丹大字资料中，至今尚未发现“糾”字。而“纠”字则有一个参照汉字制成契丹大字，再由契丹大字混入汉字，混入汉字之后又与“糾”字相混的复杂过程。女真人则参照契丹大字“纠”又造了个7号女真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之间在语言文字方面互相学习和互相影响的一个例证。

〔附〕：本文例字代号表。



注　释

①参见陈捷、陈清泉译〔日本〕箭内亘著《辽金纠军及金代兵制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7月版，28至30页。
②王国维《致藤田博士书二》，载《观堂集林》卷十六。
③陈述：《纠军史实论证》，载《史学集刊》1950年第6期，377至388页。
④朱子方：《辽金纠军考略》，载《东方杂志》第42卷第11号，1946年6月出版。
⑤谷霁光：《辽金糾军史料试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本，1948年出版。
⑥羽田亨：《读“再论辽金时代之纠军”》，载《史学杂志》第27编第1号，1916年1月，87页至88页。
⑦同①，第50页。
⑧王国维：《致藤田博士书一》，载《观堂集林》卷十六。
⑨同③，388至390页和445页。
⑩谔士：《跋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城子出土的辽大安残刻》，载《考古》1960年第8期，第40页。
⑪同⑩，第41页。
⑫同⑩，第39页。
⑬邵远平：《读宏简录元史类编》卷一，元太祖九年六月条。
⑭同①，第6页。
⑮同⑧。
⑯李逸友：《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代碑铭》，载《考古》1979年第4期，参见366页。
⑰松井等：《契丹之国军编制及战术》，载《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四册。
⑱同④和⑤。
⑲同③，第392页。
⑳阎万章：《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㉑《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77页。
㉒《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713页。
㉓《辽史》卷四十六百官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741页。
㉔《金史》卷九十三承裕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2066页。
㉕《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中华书局1965年精装标点本，第532页。